

公务员“好不好当”，得看想要啥

百姓观点

■赵丽

如果想凭公职身份另有所图，那中央禁令自然“碍事”；如果想本本分分干事、清清白白为官，那严格按照禁令、规定行事就行。在禁令之下当公务员，其实应该是更简单、更理直气壮、更神清气爽。

2013年被称为“禁令年”，中央各项制约吃喝收礼的禁令不断。最近有媒体就“禁令对公务员的影响”发起一项调查，结果多数受访者表示“公务员不好当”，个别公务员称考虑辞职。不过，也有不少人对此持不同看法，中央党校教授就明确表示，“中央的规定、禁令、要求等等，不是使当官越来越难，而是使当官越来越容易了”。

两种观点之所以对立，正是因为对公务员的角色定位不同。如果想凭公职身份另有所图，那中央禁令自然“碍事”；如果想本本分分干事、清清白白为官，那

严格按照禁令、规定行事就行，用不着挖空心思去钻营。在禁令之下当公务员，其实应该是更简单、更理直气壮、更神清气爽。

说到底，公务员是职业分工的一种，从业者是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换取薪酬，这和农民种地收粮一样。要评价这一职业“好不好干”，应该是从付出与收入的性价比这个角度考虑。现在一些人抱怨公务员“不好当”，显然是因为因工资低了，工作量大了，而是因为之前日子太过“舒服”，现在一下子卡严了，不习惯、不情愿而已。

过去的一年，中央密集下令整顿党风吏治，对楼堂馆所、公款吃喝、出差出国、公务接待、公务用车、公共场所禁烟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、具体的规定。这些“硬杠杠”为公职人员划定了严格的行为边界。在禁令之下，违规发放的福利少了，超标准的待遇没了，通过公权力谋取灰色利益不容易了。在一些想着捞油水、占便宜的公务员看来，自己的生存状态自然是变差了。眼看这一职业要回归正常生态，“当官=发财”“当官=特权”的预期要落空，一些人也因此心生去意。

确实，禁令之下，公务员要想贪污受贿、吃喝玩乐是越来越难了。但禁令把各种“歪脑筋”、“小动作”卡死了，这对公务员不光是限制，也是保护。众所周知，不少公职人员走上贪腐之路，是因为权力不受约束，“空子不钻白不钻”，“油水不捞白不捞”，个人抵不过诱惑，私欲无限膨胀所致。现在禁令当头，“越雷池”的难度变大，风险也明显增加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个人说话办事就要多想后果，多看看前车之鉴，自然也能少犯错误。此前也有一些官员抱怨“独善其身太难”，对应酬、接待既反感又无可奈何，现在中央加大了正风肃纪的力度，出台了具体的要求和规定，公职人员照着做就行了，由此也就减少了许多烦心事。公务员显然是更好当了。

由此看来，关于公务员生存状态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，正反映出有些人还没有把公务员的角色摆正，还想依靠权力追求不正当利益。奉劝这类人早些改变观念，拿出责任感和积极性去干正经事。否则，现在面对“八项规定”等基本要求都觉得难以接受，在“勤政高效”等更高的要求之下，只会更痛苦。

新闻短评

高速免费不讲谁的“政治”

■邓福寿

近日，黑龙江交通运输厅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“除夕将免费，但当日具体实行时间没有确定。”对于黑龙江的做法，东部地区一交通官员评价其为“不讲政治”。

新疆交通厅“除夕高速公路免费行为涉嫌福利歧视，使纳税人不能得到公平待遇”的高论言犹在耳，又惊闻黑龙江除夕高速免费是“不讲政治”的言论。让人不解的是，去年除夕高速免费没有“不讲政治”，为什么到了今年就不行了呢？

事实上，一些地方挖空心思为除夕高速不免费找借口，根本上是“利”字作怪。在一些地方政府眼里，高速公路收费就是一块别人不能动的“奶酪”，每逢节假日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，大呼“亏不起”便成了常态。

黑龙江省之所以被扣上“不讲政治”的大帽子，或许是因为它的做法太“鹤立鸡群”了，有点“不顾大局”的味道。但是，“讲政治”还包括了政治方向、政治立场、政治敏锐等等。黑龙江准备在今年除夕高速免费的消息甫一传出，就获得好评如潮，怎么就成了“不讲政治”呢？

其实，是不是“讲政治”，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。利于民、听计于民，关心人民福祉，理应成为所有施政者“讲政治”的出发点，希望一些地方能多讲一些这样的“政治”。

让乞讨者“无利可图”是否可行

■廖德凯

临近春节，深圳地铁内的乞讨现象有所增加。不少市民反映，在地铁上频繁遇到带孩子下跪乞讨的妇女。针对此现象，深圳运营管理办公室表示，将“积极引导市民乘客不滥用同情心，使乞讨人员无利可图，从而不再到地铁乞讨”。同时，地铁执法队将主动协调公安、民政和卫生等相关部门开展辖区的乞讨人员救助工作，及时为救助人员提供基本的衣食、住宿供给，确保受助人员不挨饿、不受冻。

在我看来，在一座城市，流浪乞讨人员能够通过人们的善心解决生存问题，是这个城市“有爱”的表现。如果一座城市的乞讨人员都因为市民“被引导”而“无利可图”，那不是什么好事。撇开一些胁迫孩子的恶习乞讨不论，城市应该有雅量接纳那些乞讨人员。

乞讨人员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了解乞讨人员产生的复杂性，进而理解他们的乞讨行为，是城市管理者的必修课。前段时间，一些城市热衷于设立“禁讨区”，是在把乞讨问题简单化。由于乞讨人员产生的根源没有解决，将人从某一区域清理出去，只不过是让他们换了个地方，并不解决根本问题。

在热闹、人流量大的地段进行乞讨，是乞讨人员正常的“经济理性”，只要他们不扰乱正常秩序、不违反法律规定，管理者及市民们大可不必视其为异端。有市民给几个钱，让他们能够生存下去，也并非不可接受之事。如果乞讨人员在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里无法生存，从而离开这座城市，那么，表面光鲜的“脸面”背后，却可能给人带来冷漠之感。

救助流浪乞讨人员，关键在于理解和宽容。《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：“国家鼓励、支持社会组织和个人救助流浪乞讨人员。”这个《救助办法》其实明白地表达了对市民行善的支持，市民向乞讨人员施舍，其实就是“个人救助”的一种形式。如果一些管理者要引导市民“不滥用同情心”，让乞讨人员“无利可图”，其实是和救助之意相悖的。

画中有话

文身苦恼

■文/小正 图/春鸣

薛女士是西安一所高校的老师，已经和男朋友谈了4年多恋爱，并准备今年10月举行婚礼。元旦时，她去拜见未来的婆婆。见面后，男友却向她提出了分手。原来，准婆婆看到她在手腕上文了一朵玫瑰花，认为她有“故事”，婚事就这样黄了。

在我们的传统观念里，文身并不是什么好事情。放到以前，一个文了身的人往往让人产生“坏人”、“品行不端”等联想。很多父母也会从小教育子女，不让他们和文身者交往，怕子女学坏。当然，如今随着社会生活多元化，文身已成了不少年轻人的时髦之举。若从年轻人的角度来看，文身只是一种审美或爱



好，与个人的品行和作风无关，不值得大惊小怪；但对年纪稍长者来说，就未必能坦然接受了。所以，也别怪新闻中这位婆婆多虑，能接受有文身儿媳的婆婆，恐怕也不会占多数。

以文身去判断一个人的品行，难免失之偏颇；以传统观念去反对文身，同样也站不住脚。但有必要提醒的是，文身有给自己带来麻烦的风险，一定要三思而后“文”。

“福利分房”，谁享福谁得利

■侯江

房价让绝大多数人头疼。但从各个角度给出的意见看，目前都不太可能得出好的效果。

广东省政协会议上，广东金融学院教授徐焰委员表示，这次主要关心高校如何减债以及福利分房政策。他认为，取消福利分房政策后，因为房价效应，很多人购房时仅考虑房价成本，哪里便宜买哪里，并不考虑出行成本。这种布局会增加汽车的使用量，无形中造成汽车拥堵，也造成心情拥堵。徐焰提出应该尝试恢复福利分房，有地有闲钱的单位可以在附近就地建房，让职工就近住房，这样可以减少40%的车辆。

福利分房这个词，离当下的中国人已经有了不小的时空距离。住房的商品

化是上个世纪逐渐形成的，普通群众早已经习惯了把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购房，至少在自购住房这一点上，大多数人是平等的。

徐焰教授提议恢复福利分房的做法，让人一时之间有时空倒错的感觉。但现在的城市不再是几十年前的，现在的人民群众的需求和消费观念不再是几十年前的，现在的“单位”，也绝不是几十年前的性质了。

诚如徐教授所说，盖房当然要有地有闲钱。但是，是不是大多数人的“单位”都有地有闲钱？那么，什么样的单位有地有闲钱？如若没有地有闲钱的“单位”就可以盖福利房，那么有地没闲钱的单位怎么办？有闲钱没地的单位怎么办？既没闲钱又没地的单位，又该怎么办？

有地又有闲钱的单位不是没有。但

这种“单位”，有能力且敢堂堂正正承认自己有闲钱也有地的，为数极少。两者缺一的“单位”如果也想给职工盖福利房，那么，买地、卖地便成了不可或缺的环节。笔者认为，政府想把这一块的工作做好，真是要完成天大的工作量。腐败的滋生、权力寻租的空间，或许都将不可避免。当然，不能忽视的是，没地也没地的“单位”，就算是承担着非常重要职能的“单位”，它们的职工将会怎样？依旧面临高不可攀的房价，还是选择跳槽离开？

在目前的大环境下，选择福利分房制度，不能武断地说是在开历史的倒车，但至少，会造成极大的混乱与不公平、不公正。专家学者的初衷应该说是好的，但是，混乱与不公正的结果，恐怕专家们扛不起这份责任。